

东北抗日斗争

史論集

第一集



目 录

简述东北义勇军对全国人民反日斗争的影响·····	李秉刚 (1)
党对东北抗日义勇军领导的几个问题·····	罗占元 (12)
辽宁恒仁、宽甸抗日游击根据地·····	胡淑英 (29)
试论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	温永录 (45)
略论东北抗日义勇军·····	江渤 周平生 王希亮 邵宇春 (62)
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反日斗争及其历史作用·····	许庆昌 罗占元 (82)
浅议江桥抗战前后的马占山·····	通 途 (103)
诚允与熙洽·····	谭 译 (119)
关于王康指示信之评述·····	罗占元 (137)
东北抗日联军战略反攻·····	张一波 (181)
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历史的几个问题·····	胡淑英 (199)
罗登贤·····	张一波 (224)
李红光·····	胡淑英 朱祥丰 (240)
张新生烈士传略·····	皖 肖 (260)
爱国军人关玉衡·····	江 渤 (276)
刘翔阁和义勇军十五路第一支军在辽北的抗斗争·····	王 驹 (297)

简述东北义勇军对 全国人民反日斗争的影响

李 秉 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东北各地迅速兴起的抗日义勇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热情。关内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救国会”、“后援会”等团体，支持和援助义勇军，并随时准备开赴东北抗日，掀起了反日爱国的斗争热潮。

富有反帝斗争传统的北平、天津、上海的青年学生、工人群众站在最前线。当时二万余名上海大学生，统一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学生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上海八十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工厂成立了许多工人义勇军队伍，要求政府发枪抗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省军民嫩江桥抗战，历时半个多月，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爱国军民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行动。该部在没有国民党政府援助的情况下，孤军抗敌，重创日本侵略军，一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阴云，全国人民极为振奋。战事发生后，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西、湖南、福建等各地民众，和旅居加拿大、澳洲、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地的爱国华侨，纷纷打电

报给马占山部，表示声援、慰问或捐助；赞扬马占山部抗日军民“明于大义，奋不顾身，饮血前方，连败日寇，忠勇义烈，举国同钦”，称赞这次战役“寒彼寇胆，壮我国威”，“亟听佳音，万众欢腾”。①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声援马占山抗日的，除了各民众团体之外，国民党的许多军队也向马占山部发出声援电，表示“枕戈待发”，“誓为后盾”。据资料记载，陆军第三师、第四师、第五师、新编第六师等十五个师和部分旅、团，以及国民政府警卫第一师、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等军事单位，都发出电报声援马占山部；第四军张发奎还发出通电，请率所部赴东北援马抗日，充分反映出全国军民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表达了誓作东北义勇军的后盾，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

在江桥抗战的推动下，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广大青年学生不断涌向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各地爱国群众所组织的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随时准备开赴东北抗日。国民党政府对民众的抗日热潮怕得要死，对爱国民众采取了镇压的方针，对民众组织的义勇军诬以种种罪名，电令各地严加制止。何应钦在一份密电中声称：“民众自行组织义勇军，弊害颇多，……上海方面，且闻有共产分子及日人参杂其间”，“对于未组织者，令其缓办；已组织者，设法令其中止”。②在这一密令下，关内各地义勇军大

①徐棻：《马占山将军抗日战》附电文，1933年2月发行。

②南京档案馆，国民党党部档案（九）五〇〇〇（二）号。

部被解散。

与此同时，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也遭到残酷镇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北京大学示威团在南京街头举行示威，被军警打伤三十余人，逮捕一百八十余人。为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十七日，北平学生联合南京和在南京的各地学生三万余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沿街散发抗日标语、传单。当游行队伍行至珍珠桥时，又遭到军警的血腥镇压，三十余人被杀害，一百余人被打伤，造成了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十八日，太原市学生三千多人向山西省党部请愿，也被打伤二十多人。南京、太原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怒潮并未减退，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却愈加尖锐。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熊希令、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黄炎培等六十多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要求国民党政府解除党禁，“万不宜复袭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国闻周报》上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中指出：“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何以竟遭三十年未有之奇祸大辱？当然亦有其渐。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然诚一检查国民党近年来在党务、政治、军事、外交上之种种表现，直无一不其目的得相反之结果。”该报九卷四期的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我们希望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我们希望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我们希望对外的维持邦交之精神来对内；我们希望以对内狡猾之手段来对外”。表示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烈愤慨。在全国人民反日爱国浪潮的冲击下，国民党的统治一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连蒋介石也不得不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旬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职务，宣告下野。

人民群众和海外侨胞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给予巨大的力所能及的支援。他们自动行动起来，捐款捐物，援助义勇军。在北平，事变后组织起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具体负责对义勇军的组织联络和援助工作。以朱庆澜为首的知名爱国人士还组织了“辽吉黑三省抗日后援会”，专门办理对东北义勇军的募捐筹款活动。关内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侨都把援助义勇军视为具体的爱国行动，因而援助十分踊跃，真是有钱出钱，有物出物。许多小学生也行动起来，他们把父母给自己的零花钱积攒起来，几角几元地集中后寄给报社，转赠抗日义勇军。广东省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女士，“破家纾难”，一次就捐出二万五千元，表达自己对义勇军的心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了给义勇军筹款，发行爱国奖卷，广大市民争先抢购，以示对义勇军的支援。在北平，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发起成立了“华北妇女救国会”，筹款捐助东北义勇军，抚慰义勇军负伤将士和阵亡遗属。江桥抗战后，以宋美龄为首的“妇女慰劳将士会”也捐款一万元，以示援助。广大海外侨胞虽远离祖国，但在丧失东北的国难关头，爱国之心和祖国人民紧紧相连，对义勇军的捐款格外踊跃。据不完全统计，“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仅海外侨胞捐助东北义勇军的款项就达二百万元，充分表达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

除了声援与捐助外，还有许多爱国民众和青年学生，组织了各种团体，冲破国民党政府的层层阻力直接开赴东北，援助义勇军，或与义勇军并肩作战。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六日，上海“青年自动赴东北援马抗日团”，在群众的欢送下

①见《大公报》1931年11月19日。

登车北上；一九三二年，又有由医护人员志愿组成的“义勇军救护队”开赴东北，参加对东北义勇军负伤人员的救护工作。此外，还有许多诸如抗日“铁血团”之类的团体亦冲破各种阻力开赴东北抗日。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国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义勇军的英勇抗战，国外报刊作了大量报道，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当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战斗失利退往苏联，取道欧洲回国时，所到之处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迎送，一致赞颂他们是中国的抗日英雄。在东北境内，也有许多经商、传教或办慈善事业的外籍人士，他们为义勇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的精神所感动，自动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支持义勇军，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帮助义勇军，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①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也激发了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反日斗志，促进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化。

国民党在一九二八年底表面上实现全国统一后，内部派系斗争迭起，从来也没有真正统一过。“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加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不仅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发表言论，抨击蒋介石误国害民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义勇军，违背国民党政府意志，起而抗日救国，进一步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东北义勇军兴起后，声援、捐助义勇军的，其中不少是国民党各省、市和部队的党部发出的。国民党潮

^①据笔者在辽宁新宾县调查，一九三二年在宾施医院的一位英籍大夫雷克德多次救护义勇军，另一位森牧师为帮助义勇军李奎润部购买电台，惨遭日军杀害。

北省党部、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天津市党部、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全体人员以及许多市县党部，都打电报声援过东北义勇军。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十五、六个师声援马占山部抗日，其中大部分是以该师党部的名义发出的。

东北义勇军推动国民党内爱国将领抗日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官兵在上海的“一·二八”抗战。蔡廷锴是北伐时的名将，后位居十九路军军长。“九一八”事变时，正奉命率部在江西“围剿”工农红军。日军侵占东北的消息传来，该部官兵极为愤慨，对于在国难当头不能到前方杀敌，反而在后方打内战，十分不理解，而因士气低落。在与红军作战中，蔡廷锴本人亦是百死一生，对于内战愈加反感，一度产生解甲归田之念。后来，该部调往上海驻防，官兵们的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据《蔡廷锴自传》所载：当时，蔡廷锴等“每日看报，十分注意东三省消息。据载，……嫩江桥一役，马部抵抗数日，倭寇不能长驱直入黑龙江，全国人心，格外振奋”，“在死气沉沉当中，我甚欲卸责结束军人生活，否则愿率本军自愿官兵，由我率领往东北援马。”^①于是，蔡廷锴召集所部高级将领在自己家中秘密集会，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均赞同抗日。同时，决定从全军中选拔出四千官兵，均以志愿抗日为标准，“稍有猜疑，则不许加入”，拟组成两个独立旅，选出张炎，翁照垣为独立旅旅长。会后，经分头宣传，官兵们踊跃报名，共得五千余人。当时已是冬季，为适应北方战斗生活，蔡廷锴又令各部购置了皮衣、皮帽、皮手套等御寒物品。

①《蔡廷锴自传》第26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在组织部队准备北上抗日的同时，蔡廷锴向蒋介石发出一份书面报告，表示自己决心北上援马抗日。在当时形势下，有一个蔡廷锴北上，就不知会有多少个“蔡廷锴”随之行动。蒋介石深知这一利害关系，急忙回示：“其勇可嘉，其事必败，千万不可行”，①，妄图阻止该部行动。“但我们热血沸腾，……那时我决心要去的时候，任何命令恐不能阻止”。②后来经过与各将领协商，蔡廷锴感到如果以十九路军的名义北上，国民党中央必不承认，而且会在外交上引起麻烦。遂决定在临出发前，“先辞去军长职，然后以国民资格组织义军，如此对内外都较适合，遂予名志愿赴东北之队号为西南国民义勇军，我则任总指挥……准备翌年正月底出动。”③

正在蔡廷锴等人积极准备北上抗日之时，日本侵略军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又突然发动了上海事变，向已准备按国民政府命令撤出上海防区的第十九路军发起进攻。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抗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④在举世瞩目的一个多月的上海抗战中，第十九路军官兵在国民党政府不予援助，甚至暗中与日本海军秘密妥协的不利条件下，打退了日军优势兵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该部之所以能毅然抵抗，并顽强坚持了一个多月之久，与上海人民、全国人民乃至广大爱国侨胞的大力支援密切相关；同时，与该部在东北义勇军的影

①②③均见《蔡廷锴自传》。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5—936页。

响推动之下，早就下定了抗日的决心并做了相应的准备也是分不开的。

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签定后，十九路军被迫开赴福建。为继续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斗争，该军官兵在蔡廷锴等将领带动下，每人每月节省出薪饷百分之一，计六千元，按月寄给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九三三年初，日军侵入热河，蔡廷锴就任“援热联军前敌总指挥，”统率所部及广东的两个师再次北上抗日。前锋抵达湖南境内时，传来长城各口陷落，政府又准备与日本和谈的消息，蒋光鼐、蔡廷锴立即通电反对，然而已与事无补，只好率军回防。同年十一月，蒋光鼐、蔡廷锴参与组织福建抗日政府，公开反蒋抗日，都是沿着上海事变前形成的抗日救国这一思想脉络逐步发展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冯玉祥一直是主战的。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上，冯玉祥提出了“武力收复失地”等三个提案，以后又多次向汪精卫、蒋介石等提出要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但均无成效。蒋介石在平息了十九路军的抗战后，大唱“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并再次向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在此情况下，冯玉祥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发出通电，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通电指出：“要转移对内的仇杀到对外的捍御”，“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在外患严重的时期，还在屠杀自己的同胞，何况是在经过了二十年内战的中国，尤其是失掉了东三省的今日……”。^①但是，这些怎能使蒋介石改弦易辙？在屡次上书而

^①《国闻周报》9卷45期，一周大事述评。

不得采纳的情况下，一九三三年日军西侵热河、察哈尔时，冯玉祥等“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背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①而转移到察哈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正是同盟军的重要力量。在同盟军的主力部队北路军中，前敌总指挥是共产党员吉鸿昌，两位副总指挥邓文和李忠义，原来都是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的重要将领。该部在收复沽源、多伦等失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地位较高的人中，朱霁青是亲自到东北组织义勇军进行抗日的第一人。朱早年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他在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推动下，于一九三二年春返回家乡辽宁义县一带组织义勇军，共召集数千人，队号“东北国民救国军”，自任指挥总监，几次攻打过义县等地，朱霁青的作法当然为国民党政府所反对，后终因孤立无援，在日军大“讨伐”下遭到失败。

东北义勇军的斗争对张学良的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一些原东北军将领回忆，张学良在事变时之所以执行对日军不抵抗的命令，除了对蒋介石的服从之外，同时还存在恐日心理，认为日军装备先进，武器精良，就是抵抗也未必取胜。但是，东北义勇军兴起后，锦西民众义勇能以鸟枪、大刀等原始武器歼灭不可一世的古贺骑兵联队，马占山部以劣势兵力阻敌半月，重创日军，以及其他各地义勇军歼敌捷报不断传到北平，这些生动的事例逐步使张学良大大增强了反日心理，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蒋介石的意志，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6页。

支持、援助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并几次向蒋介石请缨要求出关杀敌。

张学良身为国民党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当时他还未能公开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他对东北义勇军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是通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暗中进行的。当一些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或联络人员到北平汇报情况、请求援助时，张学良便通过救国会人员领到自己住处，予以接见和鼓励。据当时救国会常委王化一的日记所载，东北义勇军领导人唐聚五、李春润、郑桂林、项忠义等许多人都受到过张学良的接见。救国会联络员车向忱、黄宇宙等赴东北联络义勇军时，都持有张学良亲笔写在绢布上的密信。东北义勇军浴血奋战，最缺乏的是武器弹药。为了帮助义勇军解决这一困难，张学良多次命令从东北军的装备中拨出枪械军火，接济义勇军。战在斗辽西、辽南、辽东三角地带的各部义勇军，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武器弹药的援助。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次拨给辽南义勇军第二军区的军火就达二十多吨。是年底，又拨出不少枪械、通讯设备、服装给该部。

除武器装备外，在人员上张学良也予以一定的支持。一九三一年底，学良张派出高文斌等赴辽北组织义勇军，争取了该地蒙古骑兵抗日，粉碎了日军利用蒙奸甘珠尔扎布等人组织的伪蒙古独立军，挫败了他们在当地搞所谓蒙古独立的阴谋。此外，张学良还应救国会的请求，派出原东北军将领彭小秋出任东北义勇军第一军区总指挥，领导辽西地区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总之，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鼓舞和推动了张学良，张学良的支持又成为东北义勇军更好地抗日杀敌的一个重要因

素。

除了上述各爱国将领之外，这一期间，在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和全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的推动下。国民党其他一些上层人物，如胡汉民屡次发表言论，主张给人民以自由；宋子文在热河危机时，亦曾与张学良等一起亲赴热河，表示日军一旦进攻，政府将以全国力量抵抗等等，反映出与蒋介石之间矛盾的加深。蒋介石虽然大权在握，但由于他推行了一条违背全国人民意愿的方针，使他的统治不能不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东北义勇军之所以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它于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的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①这种感情在祖国遭到外族侵略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日本侵略者悍然占领东三省的情况下，东北义勇军所表现出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与关内人民的爱国之心，乃至广大侨胞的爱国之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而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伟大的斗争谱写了伟大的乐章。人民音乐家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深刻地反映了东北义勇军奋不顾身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爱国热情与斗争精神。东北义勇军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将继续鼓舞着我们为了祖国的富强和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勇前进。

①《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

党对东北抗日义勇军领导的几个问题

罗 占 元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义勇军的研究工作，本文依据一些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和调查情况，就党对义勇军的领导问题作一些介绍，提出一些看法。

一、“九一八”事变后至一九三三年初党对义勇军的领导情况

关于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的领导问题，在历史文献中有两条原则的提法：一条是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说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另一条是陈云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救国时报》上发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的文章中说：“

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和追击，跋涉万里，北上抗日，还领导着东北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中打击日寇。”在《陈云文选》的注解中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地人民和驻东北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日抗武装，这些武装通称东北义勇军”。这两篇文章及注解中一说党领导或协助下；一说党领导或影响之下组成了义勇军。总之，党领导了义勇军的反日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怎样实现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责任时说：“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阶级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①

党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基本上符合毛泽东同志的论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州省委、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先后发表宣言、决议。这

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53~254页。

些宣言、决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谴责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工农大众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军侵略，号召广大群众进行反抗和斗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和渗透。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坚决收复失地的主张同蒋介石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得到了全国，特别是东北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这些宣言、决议虽然尚未明确提出如何组织民众进行武装抗日的具体方针和方法，但是我党已经预见到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官兵反日斗争的高涨，一场反日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认识到党对这一斗争的领导责任。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一文中指出：“东三省的占据，象电火一样燃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使他们为了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又指示“满洲省委要立刻分配干部到南满各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和动摇不满的东北军阀军队中去发动反日斗争，游击战争与兵变。”

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里指出：“满洲事变对于中国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问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悟，在党的领导之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迅速地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又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满洲省委为发动和组织原东北军士兵武装反日工作，于九月二十三日发出《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决议对当时一部分部队士兵状况和情绪进行了分析：“在国民党命令不准士兵抵抗，甚至长官先秘密逃走，让士兵给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解除武装与施行残酷的屠杀，士兵在愤恨与徬徨（如现在还未被日军占领之区域）或溃走（被日军打毁与准备入关内的）情状之下，党应加紧领导与号召士兵群众，发动他们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缴械，反对国民党长官之一切命令的斗争，以至叛变。为要使更广大的动员他们，必须抓住他们更迫切要求（如立即发饷，反对长官收枪问题）的鼓动。在有党组织的军队中立即布置这种斗争，特别是在日本军队还未占领的区域（如北满等）。”决议还指出，发动一部分军队反抗日军进攻，到农村去，“帮助与发动农民的斗争，并深入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解除地主警官武装给农民，扩大与改编原来的队伍。”

十月十二日，中央在《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中指示满洲省委抓紧有利客观条件，领导兵士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满洲的统治阶级，驱逐日帝国主义的势力出满洲”，“争取广大士兵群众与工农斗争密切联系，组